

·建馆110周年纪念之典籍旧事·

编者按:《赵城金藏》成书于金代,是现存各版汉文大藏经中的稀世珍品。原藏于赵城(现山西洪洞县)广胜寺,1933年夏被发现。抗日战争时期,该地区为日本占领区。1942年2月,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将这部近五千卷的珍贵经卷抢运出来秘密存放。1949年移交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收藏,成为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并列的四大“镇馆之宝”。今年恰逢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经卷入藏亦将届满七十周年。本期刊发李万里《救护〈赵城金藏〉始末》一文,通过对当事人和知情者的采访,真实还原战争岁月中革命前辈为保卫这一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立下的丰功伟绩。并寄托我国图后辈的崇敬与怀念。

救护《赵城金藏》始末

李 万 里

《赵城金藏》(以下简称“《金藏》”)与敦煌文献、《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起,号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曾向笔者称赞道:“《赵城金藏》已超越‘国宝’范畴,属‘世界级’文化遗产,它比建筑旅游类遗产内涵深邃广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推广。”^①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影印《金藏》、重编《中华大藏经》,先后160多人参与编纂,历时十五载发行。有幸获此冠以“中华”之前缀的殊荣,足以彰显其重大学术和历史价值。

然而围绕抗战中救护《金藏》过程,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如1982年《北京晚报》曾有文质疑经卷抢运中是否发生过流血牺牲,从而引发争议。现据我多年采访的口述史料,特撰本文,郑重重申“血染经卷”的史实。

①本文援引,除注明出处者,均为当事人口述,笔者记录。

一、引言

1942年2月,在日本侵略者的觊觎和包围中,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成功抢运出珍贵文物《赵城金藏》近五千卷。这是二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项丰功伟绩,是文化战场上场可与军事大捷相媲美的伟大胜利。

抢运过程中因被敌发现,担任掩护的八路军还牺牲了几位战士。当年此事即以“血染的经卷”享誉太岳。随着《金藏》移交,此说由太岳区经北方大学传至北平图书馆,首发于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该报后续又发文三篇重申“血染的经卷”(详见下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金藏》仅为专业人员所知,救护时有人为之流血牺牲从无异议。然而沉寂40年,因揭裱修复成为《中华大藏经》影印底本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好事者猎奇翻出炒作。质疑首发于1982年8月15日《北京晚报》,这篇题为《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李溪林同志回忆抢运赵城金藏经过》,以李本人回忆称“智取不是武夺”为由,否定“血染”事实的存在。

被采访人李溪林(赵城县委书记、原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随即因该报导严重失真,向报社投诉,并向所在单位作了汇报,还特意向家母做了解释。李在信中说:“《北京晚报》上刊登了该记者对我访问的报导,把我讲的内容大加删改,特别是丢了史健谈话的详细内容,为此,我找记者和《北京晚报》编辑,该报编辑说,因版面太小,他有权删改,压缩。而且也不退给我原稿。”此外还说:“可是版面却刊登了我不小的头像,使人感到我有争功之嫌,其实我不过仅仅完成上级史健交代的任务,为此我还向安全部党组作了汇报。此事我给史健同志的夫人李淑文同志谈过,谈时史健同志的儿子(万里)在场。”

这份因失真而被投诉的报导,却打破40年的平静,使本无争议的事实成了问题,令原本清晰的历史蒙上迷雾,致一泓清水掀起争议的涟漪。自称赵城县长(实为岳阳县长)杨泽生(原新疆煤炭管理局局长)等回忆称“没有打一枪一弹,没有伤一人一畜”^①,推波助澜,使争议复杂化。

30多年来,我采访数十位当事人、知情者,确凿证实当时赵城县委书记是李溪林、县长为刘式(钦),他们是抢救经卷时该县的负责人。而时任岳阳县长的杨泽生当时根本不在赵城,却写出赵城抢经的回忆,与各参加单位众多关键当事人异口同声的说法相抵牾。拙作《抢运赵城金藏纪实考》(待发表)中计有23位老人否定杨泽生的任职,31位肯定李溪林的工作,并得到档案史志等材料的有力佐证^②。

①首发于1990年9月《山西政协报》,转载于1991年《山西革命根据地》和1998年3月山西《党史文汇》。

②参见拙作《澄清抢救赵城金藏的历史疑云》,《文津学志》第十辑,国家图书馆,2017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杨泽生不是当事人,又不在现场,他的所谓“回忆”就失去了依据,失实而不可信。我们应设法褪去杜撰演绎色彩,回归历史的本真。

二、当事人与知情者的回忆

1. 李纯(太岳一地委秘书长、原教育部政教司司长)回忆:

1961年6月,在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听史健忆往,我问到在二地委发生的一件大事,即抢救广胜寺大藏经的情况。他说:“日寇1940年起对根据地连续大扫荡,1941、1942两年尤其如此。二地委处在和敌人斗争的第一线,既要顶住日本人的扫荡,又要防范中央军和阎锡山军的侵扰。1942年春,在得到日寇企图抢劫赵城大藏经的情报后^①,我感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抢运出来。考虑到事关重大,刻不容缓,我立即向区党委作了请示报告(当时太岳区党委书记是安子文)。接到区党委转来延安党中央批准同意的电报后,马上组织二分区的部队与赵城县委执行了这一任务。因广胜寺周围有敌人据点,抢运过程中被敌人发觉,掩护部队还和敌人交了火,伤亡了几个战士。最后经卷抢运到亢驿地委机关中来。当时我说了一句,抢运赵城大藏经你立了一大功。他笑笑说,大藏经太珍贵了。我感到他政治上很敏锐,特别是在对待大藏经的问题上,非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不可能做得这样出色。”^②

史健(原名李维略,1937年太岳工委秘书长,协助书记安子文开辟太岳,成为太岳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40年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③),是抢救经卷的主持领导者,是全过程的直接组织者,是当时的关键人物之一,应有发言权并具权威性。他的话通过李纯之口转述出来是有份量的,不容随便置疑和否定,也是只了解局部和片段的当事人不可比的。当年这早已成共识,始出自二地委,不胫而走传遍太岳区,众所周知,从无异议。

2. 1977年1月9日,为提供史健悼词素材,在家中举行座谈。

上述事实,座谈时被李成芳(决死一纵队参谋主任、原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张天珩(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原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经理)、徐芝寅(太岳二地委宣传部长、原交通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纯、曾远(太岳二地委秘书长、原国务院参事)、刘迪(李成芳夫人、绵上县委组织部长、原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董峰(太岳区巡视团干事、原国家体改委秘书长)、家母李

^①该情报由二地委敌工部长穆彬(马殿俊)提供。其人受史健派遣,化名马廷杰,打入临汾日军潜伏,任69师团情报班长。他也是日“战地军官观战团”韩略村被歼情报的提供者。

^②《革命史资料》第1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02页。

^③详见高扬文等:《追怀史健同志》,《人民日报》1986年2月16日。

淑文(太岳二地委妇委书记、原水电部农电司司长)等一致认同与证实,并以座谈纪要形式上呈中组部。这也是我首次获知父亲生前领导过抢运《金藏》。

3. 张天珩(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回忆:听部队汇报说,抢运经卷时被敌发觉,敌人曾向我们开过火,我们部队没有恋战。

4. 王万荣(承担入寺运经的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回忆:日伪军二百多人已经离开据点往寺院涌来。凶相毕露,发兵兴师问罪来了……仗着实力他们迅速抢占制高点,集中轻重机枪一齐向广胜寺猛烈开火^①。

5. 薛国范(担任警戒的赵城县大队排长、原河南省某军分区司令员)回忆:当晚刘教导员给部队作的动员……清晨四点多钟,日伪军出动一个多连的兵力,隐蔽在山梁上的战士和群众,让过敌人的前卫部队,集中火力兜尾打了一阵机枪。敌人拖着死伤人员狼狈逃回了据点^②。

6. 史怀璧(绵上县委书记、原民政部副部长)1989年致笔者信:“我看完了你在《革命史资料》第17期刊出的《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写的很好。为了写这篇文化遗产的历史,你参阅45种参考书。我读后很受教益,所列举的抢救金藏情况,与我当时听到的完全一致。因为我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初曾在二地委绵上任县委书记。不久我就调到第一专署任专员,对浴血夺取《赵城金藏》的事十分关心。看了您的文章和我听到的是符合的。”“当我们拿到经藏时,被日寇发现了,在深夜里发生战斗。我们牺牲了有七位战士,敌人也有伤亡。经过艰苦的浴血奋战,总算把这件宝藏拿回来了。对保存祖国文化,精心部署指挥的史健同志和二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全体指战员,在夺取《赵城金藏》的伟大事业中,为党和国家立下了功勋。”

7. 王砚泉(决死一纵队兼太岳军区队务科科长,原昆明军区副政委)1992年6月致笔者信中肯定:“您写的《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我认为很好。您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是客观的、认真的、具体的,对人是有帮助的。”

8. 薄一波在《百年追思——陈赓大将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纪念篇第13页写道:“为保护好这批《金藏》,有的同志积劳成疾,有的同志甚至牺牲了生命”。

需要澄清是,多刊曾说经卷藏于绵上废弃煤窑时,薄一波关心《金藏》安危,派秘书刘元璋前往查看,途中遭遇日军付出宝贵生命。此说不实,经贺英等多人证实:1945年10月29日,下赵城检查工作的专署司法科长刘元璋等,被阎军崔道修部活埋,非抗战中掩护《赵城金藏》而牺牲^③。

①《星火燎原》第21期。

②《解放军报》1982年11月21日。

③详见张广祥编:《赵城金藏的沧桑岁月》(内部出版物),2012年,第44页。

9.有感于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黄苗子《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一文(详下),力空住持“感泣的”回忆。他在3月底全国佛协二代会上发言说:我读了这篇文章,比任何人更激动,因为这是我身历其事永远不会忘怀的景象。保护祖国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物财产,只有共产党和党所教育出来的战士才能做到……一营武装战士连夜从广胜寺舍利塔上取下藏经运送到沁源山,中途与敌人接触开火,其中有八位战士为保护这部藏经流尽了高贵的血而牺牲了^①。

10.弘一法师高足丰子恺1962年创作《琉璃塔》跋曰:

壬寅新秋,客苏州灵岩山寺,妙真方丈夜谈二十年前抢救金刻藏经故事,并索作画……一九四二春三月……八路军连队连夜发,抢救国宝为己任。九十担箩装不尽,再包土布九丈零。日寇追兵凌晨至,沁源山中起战争。保得藏经退得寇,壮烈牺牲有八人……烈士在天应含笑……琉璃塔有知也将感谢八路军。^②

跋中两处纠正了力空1944年的时间错误,“春三月”是仅见最接近于我考证的2月。“凌晨至”“沁源山”等细节之详,“箩”与“篓驮”之近,实令我惊诧绝非偶然。说明除力空外,佛教界妙真、丰子恺一定另有可靠信息渠道,惜现已不可考,而“牺牲有八人”则又多一旁证。

11.1942年5月大扫荡,日军剑指《金藏》,直奔亢驿。危急关头,史健决定带经转移,决不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出发前史健要求“每个人都要背几卷经”,还宣布纪律:“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地委机关抱着“人在经在”的决心,携经生死辗转于崇山峻岭,与敌周旋。每人负重行动,机动灵活性降低,增大了转移风险。

据老人们回忆,1942年5月是历年扫荡中最艰难困苦的一次。安子文6月在给妻子信中说:“今年的扫荡比过去是要残酷几倍的。特别是干部的伤亡,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③

反扫荡中没有不流血的,连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和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均牺牲于这次大扫荡,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反扫荡时为掩护二地委牺牲的战士其实是护卫了经卷,“血染经卷”实至名归。

12.日本人欲抢劫《金藏》的情报是从敌人内部获得的,获取和传递情报过程中,即使流血也只能是无名英雄。因“严格保密”的规定,担任警戒的洪洞县大队事后才得知是掩护经卷。洪洞大队即使有人流血,也不晓得是为了经卷。

以上证实救护赵城大藏经卷的过程中,与日军发生交火,确有战士为之

①《现代佛学》1957年第5期。

②丰子恺:《琉璃塔》立轴纸本,2011年雅昌秋季拍卖会。

③《志士情怀——刘竞雄百年诞辰纪念册》(内部出版物),2015年,第92页。

伤亡。此事绝非杨泽生所说“没有打一枪一弹”、“随意编造的无稽之谈”。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报导

1.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名经四千餘卷运抵平市”消息,其醒目副标题是:“卫护此珍贵遗产,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依据是5月14日北图举办的《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由赵万里报告此经的源流和价值,张文教报告艰苦守护及运送经过,范文澜报告共产党重视文化遗产,在极艰苦的条件下,用各种方法来保护,甚至牺牲我们战士的生命”。这些说法皆来自北方大学,是1946年秋接收移交的经卷时,从太岳区获知的。

张文教(北方大学历史学教师)发言:

秋天战争蔓延到太行。彼时此经用棉纸护藏,为安全计,放在涉县。原44箱,去掉棉花纸张,该为42箱。本人奉命运送此经,被我工作人员运往他处。敌人扫荡,我军不惜流血,尽力保卫。其后即移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范文澜(北方大学校长、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发言:

1946年即听说冀鲁豫发现一部宝经,彼时抗拒敌人,流血护经,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困难,时时有损失此经之虞。为安全计,1946年经中央决定,指令边区政府善加保护。时成立北方大学,打算将某县的吴道子壁画、蔚县的一二斤重的骨头和《赵城金藏》一并聚于北大,是为边区三宝……派人将此经运抵边区并且牺牲了几个同志……郑振铎曾提到此经,经王冶秋给我看才知其价值,然还不知重视。经赵(万里)、王(重民)两先生提示,才知此经之重要,确为国宝,藏于北平图书馆最为适当。薄一波同志对此经过情形极清楚^①,本人并已囑原负责人之一(另一位已去世^②)写篇详细文章,叙述保卫此经的经过,能帮助诸位了解详情。

上述,得到与会学者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向达(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科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学部委员)、周叔

①薄一波谈及此事时称,“在太岳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残酷‘扫荡’的斗争中还有一件应该提到的事,就是抢救《赵城金藏》……太岳第二地委、第二军分区和赵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地方武装、民兵和干部,在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等同志的指挥和广胜寺主持力空法师的配合下,从处于日军据点、碉堡包围中的广胜寺,把所存的几十箱《金藏》全部抢出,使这批国宝没有落入日寇之手”(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30页)。

②史健因病离职休养,此处“已去世”系误传。

迦(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平中国佛学院院长)、巨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龙华寺主持)、韩寿萱(北大博物馆专科主任兼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季羨林(北大东语系主任、学部委员)、王重民(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兼北平图书馆代馆长)、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程德清(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及有关领导杨秀峰(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晁哲甫(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孙文淑(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于力(华北人民监察院副院长)、王冶秋(北平军管会文物部副部长、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李枫(北平军管会文物部)等见证认可。

周叔迦说:“此经堪称国宝。战士以流血精神保卫此经,正合佛家故事,值得称赞!”向达最后发言:“从前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共产党不要文化,这部经卷的抢救保护,就是最好的回答。”

2.受此座谈会的委托,向达教授又在5月31日《人民日报》“记赵城藏的归来”一文中重申:“将藏经抢救出来,中途与日寇遭遇,我游击队战士曾为此牺牲了八位,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以道路多阻作罢,就地藏于太行山中……五月十四日得参加座谈会,听了各位先生的报告,再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象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抔,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

3.1949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高教会文管处”《赵城金藏展览》介绍:“现特将装订好的金藏分作经律论目录传记及入藏著述两部分,择优展览……它在藏经雕板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抗日期间,日寇想抢走它,幸八路军、游击队把它抢救出来。为了抢救这部名经,八路军曾牺牲了几位战士。”

4.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黄苗子(美术史家)《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当夜就派出了队伍把这部藏经运走,走到半路遭遇上了敌人,一场恶战终于完成了保护这部佛经的任务,但是,为此使得八位英雄的游击队战士英勇的牺牲了……想到这里,我仿佛看到那八位战士站在耀眼的光辉中。”1986年我采访黄苗子时回答,其依据来自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学部委员、考古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为《赵城金藏》展览所写的说明。

5.人民教育出版社“农民语文课本”(新华书店发行,1952年8月第1版、1955年12月第2版、1956年4月第3版)第三册十一课《八路军保护赵城金大藏经》:“我军刚离开广胜寺,日寇的追兵就赶来了。我英勇的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迎击敌人。虽然有八位战士光荣地牺牲了,但终于把这件贵重的文物

抢救出来，保存在中国人民的手中。”

四、小结

建国前后《人民日报》的四次报导、1961年“史健忆往”及1977年1月9日史健去世后家中的座谈，均早于八十年代兴起的《赵城金藏》热，此前“血染藏经”的史实从未有人怀疑。上引《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李溪林同志回忆抢救赵城金藏经过》一文仅抽取杨泽生等个别人回忆，未经与全过程中各当事人的说法逐一核实，未向关键当事人取证，证据不足不充分，以偏概全，自然站不住脚。局部或片段未流血，不能代表全局。全局有多大？各单位的参与者有多少？时过境迁，穷举法已不可能，故应以当时全局主持者二地委书记史健的回忆为据，以1942年起即在太岳区广为人知、有序流传的说法为证。

《北京晚报》该文作者1982年曾来单位采访我，我将李纯等回忆及联系方式告之，希望能秉公再访。未料，他竟对李纯口述史健回忆之重要情节视而不见，匆匆发表质疑的文章。该文列举的多不是抢救经卷单位的直接当事人，而局部参加者仅李溪林、王万荣二人。受其采访的李溪林亦因严重失真垢病该文，并予以投诉。而对王万荣回忆则选择性取舍，不够客观。却未提及真正担任警戒的赵城和洪洞两个县大队，其实阻击敌人首先流血的必是他们，而不是被掩护的取经者基干营等。该文标题哗众取宠而证据不足，内容以偏概全，有误导性宣传，打破40年来共识流传有序的平静，使本无争议之事成了问题。既对八路军英烈不恭，也是对历史不敬，将《金藏》抢运史研究引向歧路。

当今，护卫国宝“血染经卷”是功绩，已被人们充分理解和赞赏。然而在“要破除迷信”的年代，承认为“旧迷信”之一《金藏》兴师动众，还牺牲了八位战士，并非光荣，甚至可能成为“迷信”的罪状，是需要拿出“实事求是”的勇气，因此绝无“自我描黑”而杜撰的可能和需要。较之“争功讳过”，通常“争过讳功”的史料是可靠的。也验证了历史研究的一般通则，即距离事件越近的公开发表——如建国初《人民日报》四次报导——往往是可靠的。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战斗中，无神论的八路军主动、成功地抢运出近五千卷有神论的《金藏》，并付出流血牺牲。一扫圆明园被明火执仗抢掠和敦煌遭不露声色巧取的前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文物保护史上的典范，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它雄辩地证实了我党一贯奉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八路军是中华文明和祖国文物的忠实保护者，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简介】李万里，原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李维略）之子。高级工程师，北京电子学会咨询顾问，2006年退休。